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北京『二月逆流』

刘少奇的三顶大帽子我所知道的林彪和叶群
周恩来在1968珍宝岛事件『文革』时的改名



往事

——1967—1969 写真

蒋元明 /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1967—1969 写真/蒋元明主编·—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往事系列丛书)

ISBN 7-80647-144-8

I. 往… II. 蒋…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1710 号

书 名:往事——1967—1969 写真
作 者:蒋元明主编
出 版
发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新魏路 17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7.125
字 数:16 万
版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3001—8000
定 价:13.00 元

ISBN 7-80647-144-8 / I·110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王 东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	(1)
范 硕	北京“二月逆流”	(2)
刘东之	“一读骚经一肃然”	(18)
王 东	刘少奇的三顶大帽子	(24)
蒋 铎	周恩来在 1968	(27)
蒋 铎	林彪笑里藏刀	(33)
官伟勋	我所知道的林彪和叶群	(39)
王 东	林彪叛逃	(82)
王 东	文革中的时装	(84)
王 东	文革时的改名	(86)
柳 萌	我所知道的“内人党”及其他	(88)
赵大年	“牛棚”的日子	(103)
英 夫	团中央五七干校一段情	(112)
许 林	《人民日报》干校片断	(118)
叶延滨	知青岁月	(130)
张春熙	“工作组”与“支左”	(135)
蒋元明	毛主席像下的故事	(141)
蒋元明	当兵西北	(143)

兵团岁月

范凡生	我的大学——北大荒	(150)
杨 越	北大荒的记者生涯	(154)
郑 毅	扛麻袋	(160)
赵树燕	养猪	(163)
邓小南	当小学老师	(169)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

王 东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领导权。8日，毛泽东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都给上海造反派团体发了贺电，《人民日报》发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

上海发生了一场革命风暴，停水，停电，停交通，到处造反，一下冒出很多的造反司令部。报社派我和一位同志去上海看看。我们听完唐平铸总编报告后就出发了。一出上海火车站，就看到一条大标语：打倒唐平铸！怎么昨天唐平铸还好好的，今天就被打倒了？

我们想找一下上海市一级造反派司令部了解一下情况，打听多处，谁也不知道这个司令部在哪里，又说他们就是总司令部，在一个宾馆找到一个总司令部，到处乱哄哄的，把我们安排在一个仓库住下，没有床，只有一堆棉花套，一月份上海还是很冷的，一人盖上两个棉花套。在半夜，造反派说，他们要出去执行任务，让我们睡觉。天亮他们回来了，带回一些面包，让我们吃。我们感到这里不像个什么总司令部，又另找别的地方去了。

北京“二月逆流”

范 硕

大闹“京西”

提起 1967 年“文革”往事。人们不能不想起威震华夏的“大闹京西”。当时，我正从南方出差到北京，一位首长在京西宾馆开会，只听说“闹”得很厉害，不敢打听，未知其详。若干年后，因工作需要，曾聆听叶剑英元帅讲起此事，又访问当时参加会议作纪录的同志，才弄清内幕。

1967 年 1 月 19 日。这天下午室外温度在零下十度以下，寒风袭人。但是京西宾馆一个大会议室里却热气升腾，充满火药味。

这里名义上是开会——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实际上却摆开了“唇枪舌剑”的战场。会场上靠北面第一排中间座椅上坐着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和叶剑英元帅三位军委领导人。同排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康生、江青、叶群等人。江青紧挨着叶帅坐着。下面依次坐着各总部、各大军区领导同志，以及空军、海军、各军兵种负责人，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共 40 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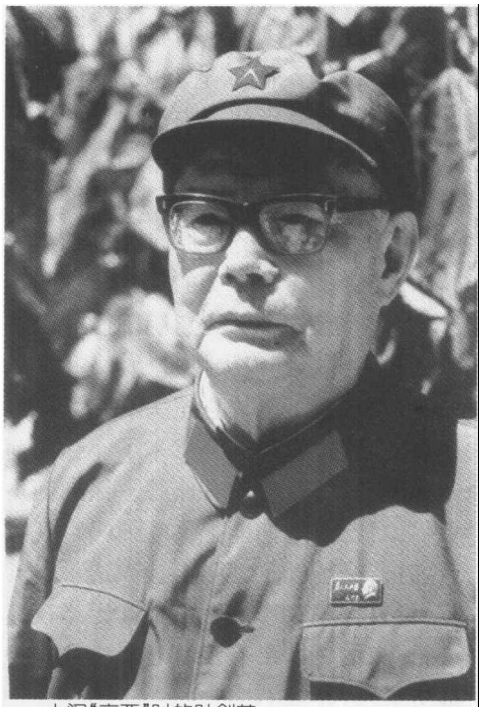
会议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展开了争论。

江青、陈伯达、康生、叶群等以“主角”自居，逐个发言，大叫大嚷：军队不能特殊，一定要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

样搞“文化大革命”。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则持反对意见，力主军队不搞“四大”，维护军队的稳定。他们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责任，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叶剑英旗帜鲜明地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他质问道：“这样搞下去，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怎么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军队没有

铁的纪律，松松垮垮，打起仗来“放羊”，就不成其为军队了！

但是，江青一伙仍然摆出种种理由，坚持军队搞“四大”。突然拿总政“开刀”。叶群站起来，向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发起攻击，说肖华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把许多罪名强加在肖华头上，要他当晚向院校师生作检查。接着，陈伯达摆出中



大闹“京西”时的叶剑英。

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说,肖华是个“绅士”,不是个“战士”,说他“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江青旁敲侧击,竭力帮腔,对肖华进行辱骂攻击。她指着肖华的鼻子问:今晚工人体育馆召开的10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逼迫他到会上说清问题。否则,要调换总政主任。这是明目张胆要撤肖华的职!江青、陈伯达一伙围攻肖华的险恶用心是妄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到会的同志一听便不吭声了,以沉默表示对抗。大家心里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最终目的是要打倒叶剑英等元帅,夺取军权。叶剑英、聂荣臻极为愤慨,未等会议结束,就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肖华,周恩来支持叶剑英的态度。

令人奇怪的,这天晚间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整个北京发生了轰动事件,满街都是“打倒肖华”的大字报。“造反派”连夜向肖华发起“突然袭击”,跑到景山东街围住肖华的家去抓他。肖华听到前门有人敲门,就从后门离开,跑到傅钟家,坐上一辆小车飞驰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藏起来。

第二天,2月20日上午,京西宾馆继续开会。原班人员继续争论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明知“造反派”昨晚抓肖华的事,看到肖华没有来,故意阴阳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看到没人搭理她,又幸灾乐祸地说:“好啊!总政主任不见了,开小差了?”故意扭头看叶剑英。叶帅正气凛然,不予理睬。说来也巧,这时肖华突然来了。徐向前想缓和一下气氛,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肖华没有作答。徐向前生气地对肖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江青等得势不饶人,紧追不舍。这时,会场气氛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突然,一直沉默的叶剑英,指着肖华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他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击桌子,伤及右掌。

散会回家以后，他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骨折。可见他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后来，我见到叶帅，问他“大闹京西”之事，他仍然一脸正气地伸出右手给我们看，手掌已经恢复正常了。

一向和蔼可亲的叶老帅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但是，他们并不罢休，加紧密谋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肖华。叶剑英得知这一情报，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总理立即打电话给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肖华不能去大会检查！”

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被暂时压了下来。陈伯达也不再提抓肖华了，他当晚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转告叶剑英：昨天因为安眠药吃多了，讲肖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要收回来。

这就是当年“大闹京西”的大致情形。这个“大闹”实在是“闹”得好，好得很！它实质上是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几位元帅和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一次公开抗争，抵制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维护了军队的稳定局面。

大闹“怀仁堂”

如果说“大闹京西”，拉开了斗争的序幕，紧接着发生在怀仁堂的一场“大闹”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四人帮”公开抗争的继续，其规模更大，斗争更复杂，影响更深远，为文革开始以来所没有的。

1967年初，来自上海的“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全面夺权”，其矛头首先冲向中央。从1月中旬起，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等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资格，处于“靠边站”的地位。这种非常状态是建国以来所未有的。全国一切善良的有正义感的人们都在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事态将

如何发展? 如何收场? 人们都在关注周恩来, 希望这位人民的好总理能妥善处置, 稳住局势。周恩来果然不负众望, 为了在非常状态下能继续保持一种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 以便于处理和决定党和国家日常工作, 他提出了“碰头会”的办法。2月2日, 他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 “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 10 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 以文革(小组)为主, 我参加, 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 其他有关同志按问题性质临时通知参加。” “二、提议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 3 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开碰头会, 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 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 务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 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

风雪交加, 寒气逼人。2月11日, 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



怀仁堂。

召开中央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怀仁堂会议里，铺着白台布的长方形会议桌，正中间坐着周恩来，一侧坐着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谢富治等，另一侧坐着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两军对峙，阵垒分明。这次会议原拟的中心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起来却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三大重大原则问题作了全面摊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陈伯达、康生等人在京西宾馆刚刚被“大闹”之后，因为有毛泽东给他们撑腰，气势又壮了起来，就上面几个问题，继续纠缠，仍然叫嚷“革命有理”，“老家伙该批”，军队就是要搞“四大”，气势压人。

这时，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接着，聂荣臻也生气地指责他们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恿一些不明真理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看到老师们出了气，争论暂时不会有结果，便宣布休会。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继续进行。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

各口如何“抓革命，促生产”，但引起更激烈的斗争。

斗争是由陈丕显的问题引发的。在怀仁堂会议室的门口，谭震林拉住张春桥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所以提出陈丕显的来京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总理力排万难，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仍有一部分同志在当地被无理地扣压着，陈丕显就是其中的一个。张春桥摆出一副正经面孔，狡猾地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听了十分生气，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再次严肃地提出了陈丕显的问题。谭震林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委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张春桥推托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打断他的话，大发雷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质问：“崩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

这时，谢富治打圆场说：“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谭震林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他站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周恩来看谭震林要退出会场，便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

斗争!”谭震林走了几步,转回身子,面向会场:“陈老总,我怕就不讲,讲就不怕,我哪也不走!”

会议顿时紧张起来,双方互相对视着。

这时,陈毅发言,打破冷场。他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在长篇发言中触到了三个“痛点”:一是斯大林;二是赫鲁晓夫;三是延安整风中的内部问题。他说:“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了吗?”

接着,叶剑英讲到党的传统,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拍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大搞逼、供、讯。”

谭震林又开口了:“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从旁开导:“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生气地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这时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件事,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这篇社论指的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有“对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这样的话。

康生明明参与炮制这篇社论,这时却当面撒谎,说他没有看过。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现在政治局还没有解散。”

陈伯达不得已,假意检讨:“我们疏忽了,今后一定注意。”

李富春严肃地提出批评:“如果我们不讲话,或者违背良心讲点时髦话,就不会得罪人,就平安无事。可我们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要敢讲真话,就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希望文革小组的同志认真听取老同志的意见,把运动引到正确的轨道上。”

陈伯达打圆场说:“我们回去一定认真研究。”

周恩来问康生:“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康生连说:“没有,没有,我有点头疼。”

康生、陈伯达一伙被老革命家的威怒震住了。老革命家们群起反击,当面斥责林彪、江青一伙,发泄对“文革”不满,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是真理战胜谬误,正气压倒邪恶的一次面对面的交锋。

所谓“二月逆流”

2月16日“大闹怀仁堂”事件并未结束。会后第二天,被称为“谭老板”的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斥责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很狡猾,将这封信报送毛泽东,并附信写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这无疑是“火上烧油”。江青听到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对谭震林等恨之入骨。

“大闹怀仁堂”当夜,张春桥等到钓鱼台向江青密报。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在江青策划下,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向毛泽东汇报。张春桥在汇报中歪曲事实真相,捏



1967年2月，叶剑英在北京的住所。

造罪名，诬陷老同志。张春桥抓住机会攻击周总理，说周恩来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转告他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交文革小组讨论。”从此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便“顺理成章”了。

毛泽东听了张春桥等人告“黑状”，特别是有人翻延安整风的老账，公开反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很生气。

2月19日凌晨，他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16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作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徐

向前、叶剑英等，指责他们是“翻案”，是“复辟”，并且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毛泽东这次确实是动了肝火。康生说：“我跟毛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作了检讨，为这次碰头会承担了责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他自己先作自我批评，为他人承担责任。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作检讨。

在批斗会上，康生气冲冲地说：“毛主席发怒，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义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对主席嘛！”

江青无理指责说：“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接着，康生挥着手，气急败坏地叫嚷：“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种政府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各种帽子、棍子满天飞来。什么“俱乐部”呀，什么“黑干将”呀，什么“联络员”呀……种种罪名，不一而足。而最大的罪名是将“大闹京西”、“大闹怀仁堂”以来“三老”、“四帅”在不同会议批评“文化大革命”，诬蔑为“二月逆流”。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坚决粉碎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等一幅幅大标语贴满了北京城。社会上大规模掀起了“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造反派”高喊击退“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个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从此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原由周恩来主持各副总理及

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取代，被迫停止。但批判斗争却一直没有停止。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大肆批判“二月逆流”。谭震林被剥夺了参加中央全会的权利。参加全会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遭到围攻。康生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林彪说：“‘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这次全会公报说：“全会严肃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被反复折腾，直到毛泽东亲自找几位无帅谈话才有所缓解。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从此，对“二月逆流”的批判才淡了下来。

两个“大闹”的继续

几位开国元勋，被打成“二月逆流”以后，受尽了屈辱和摧残，处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贺龙被扣上“二月兵变”的罪名，首受其害。朱德被诬为“旧军阀”。彭德怀“新老账”一起算，再次被批斗。陈毅被打成“老机”、“老右”。聂荣臻主管的国防科委，被“九·一五”、“九·一六”两大群众组织纠缠得不可开交。徐向前领导全军“文革”招来横祸，被迫靠边站，勒令检查。刘伯承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难。惟独叶剑英还挂着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勉强地支撑着军委大厦。他和尚未被打倒的徐向前、聂荣臻两位元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想尽办法，稳定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当时毛泽东提出“三支两军”，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

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为了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几位元帅商量，提议召开军级以上干部会议统一认识，解决军队在“文革”中的一系列问题。并就此事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作了专题报告。经过毛主席批准后，从1967年2月下旬到3月下旬，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100余人。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題，都可以谈



复出不久的谭震林。 王东供稿